



何其芳
散文选集

HEQIFANG
SANWENXUANJI

1250602

何其芳散文选集

林志浩 编

何其芳散文选集

林志浩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1/32 印张6 7/8 插页2 字数141,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书号: 10151·855

定价: 1.60元

目 录

序言.....	林志浩 1
雨前.....	32
黄昏.....	34
独语.....	36
梦后.....	39
炉边夜话.....	42
伐木.....	46
哀歌.....	48
货郎.....	53
楼.....	56
迟暮的花.....	61
梦中道路.....	66
街.....	72
县城风光.....	79
乡下.....	87
私塾师.....	96
老人.....	103
树荫下的默想.....	109

某县见闻	115
我歌唱延安	121
老百姓和军队	127
韩同志和监狱	138
记冼星海同志	141
饥饿	146
回忆延安	153
论工作	162
论救救孩子	169
论快乐	174
“自由太多”屋丛话	180
扇上的烟云	189
《刻意集》序	192
《还乡杂记》代序	198
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207

序 言

林 志 浩

一

何其芳代表了旧社会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理想的人生，但不明确方向和出路，在经历了长期孤独的苦心思索和寻求之后，于彷徨和苦闷之中，认识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才告别了旧世界，开始了有意义的生活。终何其芳一生，率真谦逊，严谨认真，默默地从事自己所爱好和党所分配的工作，并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学遗产，有诗歌、散文、小说、政论、文艺评论等。因时期不同，思想认识和生活内容殊异，成就也有参差。早期以诗歌、散文见长，后来则以文艺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享有盛誉。现仅将他的散文选编成集，奉献于读者之前。

何其芳，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出生于四川省万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原名何永芳，上中学时，一位赏识他的国文教员给他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在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里，何其芳幼年享受着祖母和母亲的钟爱，于优裕的物质生活之外，还接受美妙的民

间传说和优雅的诗歌艺术的熏陶。祖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最初的文艺种子，这对他是多么值得怀恋的金色的岁月。

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接近六岁时，他就被封建主义的教育牢牢地捆绑住，过早地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和欢乐。他开始跌入忧郁、愁苦之中。主宰他命运的就是他的封建家庭和家长。

祖父何铁生，擅长医术，以治眼疾闻名乡里，是颇受人敬重的老人。但他的思想守旧，用封建宗法观念来维护家庭秩序，并以此影响和制约着全家人。

父亲何伯嵇，思想保守而顽固。辛亥革命后，清朝已被推翻，他仍固执地认为没有皇帝的时代终究会过去，科举制度一定要再兴。出于这种浓重的封建观念，他望子成龙，期望儿子日后能考取功名，光祖耀宗，于是整天以读四书五经、学做试帖诗相逼迫。由于何其芳是他六个子女中唯一的儿子，这种逼迫就更加厉害了。再加上何伯嵇性格急躁暴戾，儿子稍不听话，他就用竹板子抽打。他不许儿子玩耍嬉戏，更不许读小说，念诗词。何其芳幼小的心灵开始受到伤害，性格也被压抑成怯弱、孤僻。他终日落落寡欢，生活过得灰暗无光。

到了六岁，何其芳被送进私塾，开始正式念书。除了八岁时，因躲避军阀战乱，随同母亲等人去湖北宜昌住过两年外，他在私塾里一直呆了六个年头，换了三个地方。在那里，他读着经书，听着塾师讲些荒诞的故事，头脑被禁锢得听不进一丝科学的道理。“大地象一个圆球”，——这是他的一个叔父转辗听来才告诉他的。但他因为自己读过

的书上没有这样讲过，竟认为这是异端邪说，不可相信。

私塾生活的刻板枯燥和塾师的无知保守，引不起他什么兴趣。从十二岁开始，他利用每年放假时间，爬上家里的阁楼，读着暗自找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书。后来，又在一个红色的大书箱里，来回翻腾，找到了一本《昭明文选》，他又开始读那似懂非懂的《两都赋》、《三都赋》……他找到书就读，甚至连《薛仁贵征东》之类的旧小说，他也废寝忘食地读。但是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还是他自己找来并熟读的《唐宋诗醇》和《诗学正鹄》这两部书。尤其是《唐宋诗醇》里所收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和陆游六大家的诗，更引起了他对诗歌的莫大兴趣，这在他后来写的《写诗的经过》中有着清楚的说明。他爱好诗歌，就是从这时开始。其中杜甫和李白的某些诗篇的艺术魅力，给予他无穷的快感，他一直喜爱到老年，兴味不衰，赞叹不已。

挨到十四岁那年，私塾的桎梏使他无法再忍受了。

“由于一种朦胧的欲求，一种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对新环境的渴慕”，他哭泣着要求家里让他去上中学。大概由于时代终究前进了，家里也不得不答允他的要求。他开始上的是万县第一高小；过了一年，又考上了万县一中。新奇的学校生活，给他带来了希望和欢欣，也点燃了他学习的热情。由于小时候对文学有一些自学得来的知识和能力，在国文课的读、写方面，他显露了过人的才华。在全县毕业生统考的一次作文中，他根据《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题目的要求，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尽情阐发他幼年所萌动的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初步民主思想，因而获得了第一

名。他的文章还被登在万县《民众教育月刊》上。

这时候，何其芳学习白话文，接触新文学。一位英语教师介绍他读了安徒生的童话：《小女人鱼》、《丑小鸭》和《卖火柴的女儿》。它们引导他走近了文学。在他读过的“五四”文学作品中，他对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春水》，在情趣方面比较投合。他还爱读闻一多和泰戈尔的诗。十七岁那年，他自己也学着写起诗来了。这些诗有的发表在万县《民众教育月刊》上，如《筇篹引》、《拟古歌一首》。但更多的却由于年代久远，他本人也记不起来，而散失湮没了。

这时正是蒋介石血洗革命时期，但它给何其芳留下的只是“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的印象。他钻进书本里，不问政治，也很少和周围同学往来，洁身自好地过着寂寞的岁月。不料，万县中学闹学潮，这个竭力避免陷入倾轧漩涡的书呆子，竟也遭到牵连，被学校开除了。从此，他更以书本伴随孤独的生活来保护自己了。

以后，何其芳又在重庆治平中学和上海中国公学读书。他靠自学，广泛地涉猎中外古今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一九三一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但这却成了一个“偶然的错误”。他原来认为“作为了解欧洲文化的基础必须明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演变”^①，等到他走进哲学系的课堂，教授们的讲课，却使他如堕入云雾中，顿觉索然无味。多少年以后，他追忆往事，还不胜感慨地说：“旧的教育不是叫人睁开眼睛，而是用各种迷魂帕来迷惑

① 《还乡杂记·代序》，载《何其芳文集》第二卷，124页。

人的。许多极其简单的道理都被弄得颠颠倒倒，胡里胡涂。”^①然而，他又说：“我那时真迟钝得很，我没有怀疑这些死去了的外国人的学说，却认为我自己的头脑不适宜于学哲学。”^②于是，他和从前一样，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用一些诗和散文，……。”^③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侵略者的炮声，也没有把他震醒。后来他在《论工作》中写道：那时“我正做着‘一些美丽的辽远的梦’，明白点说，就是胡涂地过着日子。”对于过去的生活和思想，他曾这样真实而痛苦的回忆道：“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冷酷，卑微。我以为那是人类唯一的粮食……吞咽了很久很久。然而后来书籍给我开启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门。从此我极力忘掉并且忽视这地上的真实。我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我沉醉，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④在大学三年级时，何其芳在同学的相互影响中，觉得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长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他想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于是他开始了有意识的散文抒写。“我是从山之国来的，让我向你们讲一个山间的故事。那么你对于山很有感情吗。不要问我，你简直敲到我悲哀的键子上了。……”这就是他的散文《岩》。写着写着，何其芳逐渐感到不满足了。他感

① 《还乡杂记·附记二》，载《何其芳文集》，246页。

② 《还乡杂记·附记二》，载《何其芳文集》第二卷，247页。

③ 《一个平常的故事》，载同上集，216页。

④ 《街》，载同上集，82页。

到“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他感到这人世间缺乏爱。但由于思想的局限，他还没有把“这个世界不对！”呼喊出来，更没有想到去改造它。这说明这时他既不了解人世、更看不到未来。这些思想情绪在这个时期写的诗文中有着充分的反映。诗收在他第一个诗集《预言》里，散文收在《画梦录》中，小说、戏剧收入《刻意集》。此外，他和卞之琳、李广田合编的《汉园集》中（他的一辑是《燕泥集》），也留有这些思想的痕迹。

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制造“满洲国”之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关内。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热河失守，平津危急。由于北平各校通知学生离校，何其芳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曾一度离开学校。一九三五年北大毕业后，他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中学当教员。在南开这所制造中学生的工厂里，当骄阳酷暑时，他被安置在一间西晒的小屋里，过着和曝烈的阳光、成群的苍蝇以及嘈杂的喧嚣作斗争的生活。在那些坐着小汽车上学的阔人子弟的眼中，他远不如这些少爷家里的车夫。有个买办的儿子白天在学校里听他讲白话文，晚间在家里却听着家庭教师讲经书。这使他无法忍受，他感到一个被雇佣者的耻辱，感到工作的毫无意义。更有甚者，学校附近的奥水河边的洼地里，停放着穷人的许多无力埋葬的棺材，常有野狗来扒开它，偷吃里面的死尸，……。他“再也不能继续做着一些美丽温柔的梦，而且安静地用心地描画他们”了。总之，现实生活在逐渐教育着他。他开始感到生活的可怕，它有时候会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甚至会把人压得发疯。

来到莱阳中学，他的视野更开阔了，找到了“精神上的新大陆”。他看到了农民要用土地收入的一半来缴租，过着极端贫穷、落后的生活；看到了每月只有十二块钱薪贴的师范生，他们经常吃着小米、番薯、四等黑面，却热情关心政治，从事救亡宣传而惨遭逮捕……。他看着无数的人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因而忘记了个人的哀乐。“这个世界不对”的反抗思想终于成熟而结成果子，他发出了宣言：“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并进而肯定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这就应该用人的手去毁掉。他决心放弃冷漠和孤独，走向人群，走向斗争，抛弃了原先的消极情绪。在这期间，他曾回过故乡四川。回来后，在课余，写出了回忆中的故乡的一角，这就是《回乡杂记》——既是他散文中优秀的篇章，也是他思想变化的真实记录。作品的感情粗起来了，这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虚幻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

抗战开始后，怀着要对人们作启蒙工作的愿望，他回到家乡，在一个县城的师范学校任教员。不久又到了成都，一面教书，一面写杂文。他的杂文表现了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极大愤慨，和对不觉悟的人们的批评、劝说。社会上浓厚的读经空气，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残余，……都在他的抨击之列。他还自费创办小刊物《工作》，并亲自从事校对和发行。这时写的杂文，也发表在《工作》上，后来收入《星火集》。

几经波折，何其芳逐渐和时代呼吸相通。但周围的人们却不理解他。他发表《论周作人事件》之后，更引起朋友们的非议。他们不是说他“刻薄”，就是怪他“火气过

重”。这使他感到势单力薄，莫名的寂寞又重新袭来。启蒙工作难于奏效，他成了“一个打了败仗的个人主义的散兵游勇”，“才想到去投奔一支苦战了十余年的大军”^①。在得知沙汀要去延安的消息后，他就跑去要求一同前往。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同意，他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动身，沿川陕路北上，奔赴目的地。“歌声一路入延安，旭日东升仰面看”。何其芳在经历了长期的孤独、抑郁、挫折之后，向着阳光明媚、温暖如春的土地走去时的心情，是多么难以描摹的激动、欢畅啊！

延安的一切，何其芳都感到新鲜，觉得可写的东西很多很多，而首先嗅着、呼吸着而且感到满意的是延安的“空气”。到延安后，何其芳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饱蘸激情的笔，写下了第一首对延安的颂歌：《我歌唱延安》。这一年的十一月，何其芳随贺龙部队到晋西北前线和冀中根据地，从事宣传工作。由于他到延安还带着“一种写作上的企图，打算专心写报告”，换句话说，就是“带着一脑子原有的思想和个人的愿望”赴延安，他对革命的目的和自我改造的认识还不明确，所以到了前线，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他带着作客的思想，不去参加基层生活和战斗行动，不同民运工作者一起奔赴敌我争夺激烈的地方，不去经常和老百姓打交道，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只是呆在政治部里，和几个同时上前方的知识分子天天生活在一起。于是，旧的情感回潮了，个人的念头抬头了，最后他竟感到自己在前方是一个没有

^① 《星火集·后记一》，载《何其芳文集》第二卷，267页。

用处的人，因而返回了延安。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何其芳认识到这是知识分子怕苦的结果，是一种羞耻的退却，曾不止一次在诗文中以万分歉疚和不安的心情谈到它。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他在《忆昔》一诗里，还沉痛地写道：“从戎投笔应经久，持盾还乡绝可怜。烈火高烧惊旷宇，奈何我独告西旋！”

一九三九年，何其芳回延安后，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为培养党的文艺干部，付出辛勤的劳动。后来曾得到毛主席的好评，说他做事“认真”。一九四二年七月，他和鲁艺第三期学员牟决鸣结婚。他们相依相爱，伉俪情深，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可怀恋的岁月。

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何其芳以深刻的教育，他真正找到了自己思想的症结所在：“我过去的生活、知识、能力、经验，实在太狭隘了。”而在这一切事情之中，有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必须在思想上武装自己。^①同时，他懂得了“为谁服务最根本”的道理，才下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从此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有了可喜的变化。

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报告文学，热情歌颂延安和根据地的新生活，这些后来都收入《星火集》。

一九四四年春和一九四五年秋，何其芳两度被党派往重庆，担任《新华日报》副社长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① 据《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载《何其芳文集》第二卷，256页。

在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的领导下，从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党的有关文艺和文化的方针政策，并针对重庆文艺界的情况撰写不少评论文章。

何其芳第一次到重庆，曾和刘白羽同志一起，对重庆文艺现状作过调查研究，并建议党中央宣传部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由周恩来同志来领导。文艺座谈会共开过三次，同志们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认真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同时对当时出现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和作品，也开展积极的批评。他写的许多评论文章，在国统区文艺界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关于现实主义》一书中。

在这期间，何其芳还接替邵荃麟同志编辑《联合特刊》，以后还创刊出版《萌芽》杂志。这些工作对于团结和培养文艺工作者，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此外，他还为《新华日报》副刊和其他报刊写过不少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后来编成了《星火集续编》的集子。

一九四七年春，何其芳随吴玉章同志撤回延安。同年十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工作，以后又担任了朱德总司令的秘书，随同他到过冀中平原的不少地方。全国解放后，何其芳到北京，在马列学院（现为中央党校）当教员。一九五三年二月调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后来改属中国科学院（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其芳担任所长，潜心于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主编《文学评论》。他积极参加文艺思想的论争和文艺作品的评论，编有《西苑集》、《文学艺术的春天》和《论〈红楼梦〉》等集子。

十年浩劫期间，何其芳受到了严酷的打击。他被抄家、审查，被戴上“黑帮”、“走资派”的帽子，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围攻和折磨。

在干校，他带来个小箱子，里面放着他惯用的白道林纸，还有几本经典著作和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纸，他是想用来写东西的。这些年，想写长篇小说的念头从未打消过，而且常常为没有时间写诗而苦恼。读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是为了配合经典著作的学习，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①。在一天繁重的劳动之后，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常常认真地读着带来的书。他想得很多、很远，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仍然十分执着，这对于一个身处逆境、又患有脑血管硬化和心脏病的人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又要具有多么大的毅力啊！正是这种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和乐观精神，给了他无限的安慰和无穷的力量。

一九七一年春，何其芳按照党中央的有关规定，作为老弱病残者被批准回到北京。当时，他未获“解放”，没有工作可做，而且文研所能否存在尚不可知，他今后的命运更是未可逆料。但是，作为革命战士的何其芳是不会停止战斗的。

在这期间，何其芳心绞痛频繁发作，有时一星期发三次，有时连续三天都发作，他却仍然勤勉地学习和译作。这充分表现他对革命文学事业的忠贞之心。在“四人帮”肆虐时期，他被剥夺了写文章的权利，但他又拿起笔来从

^① 据杜书瀛：《痛失良师》，载《一个平常的故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事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他不精通德文，却毫不气馁地从头学起，而且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扫除译作中的障碍，通宵达旦地劳作。他还希望通过对德文的学习，能够直接阅读马、恩的原著，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不仅表现他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而且表现他对当时恶劣的政治处境的抗争，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愤慨和蔑视。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四日，他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更是充分地表现他那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和革命精神。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何其芳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一直在受着歪曲、诬蔑和攻击，真是有口难辩，有理难申，有笔无处写。但何其芳却横眉冷对，愤然拿起笔来，写出这封正气凛然的信。这封并未公开发表、在当时也不可能公开发表的信，却使他遭到了更加恶毒的诽谤和残害。这封信被打成“文艺界右倾翻案的代表作”，何其芳因此被诬陷成替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的人物。在这期间，姚文元还借上海一个文艺青年和何其芳通信一事，故意歪曲信件内容，罗织种种罪名，变本加厉地对何其芳进行政治迫害。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人民得到了解放。何其芳也开始摆脱厄运，他沉浸在万分的欢畅、欣喜和激动之中。

但是，何其芳始终相信，坚冰既然开始消融，就会完全解冻；扬眉吐气的春天，一定会降临人间。他又是开会，又是看材料，又是看稿子，又是写文章。翻开他的遗著，那里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辛劳和心血的结晶。新诗六首，旧